

“崩殂”于台湾的蒋介石

蒋介石 幼名瑞元 学名志清 后改名中正 字介石 ,1887 年 10 月 31 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地区奉化县溪口镇一盐商家庭。早年就读于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学堂和奉化龙津中学。1907 年考取官费留学生，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学堂炮兵科学习。在此期间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1910 年冬，从振武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日本陆军野炮兵第 13 联队见习。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 任沪军第 5 团团长。此后 他跟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先后出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第 2 支队司令、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等职。1924 年 5 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率黄埔学生军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平定商团叛乱、镇压杨希闵和刘震寰叛变等战斗。1926 年 3 月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 1 军的军权 同年 5 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领导层 并窃取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从而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1927 年 4 月 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并通令各地反共“清党”，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1927 年 8 月在国民党内反对派的逼迫下，通电下野，东渡日本。1928 年 1 月重新上台 同年 10 月 10 日，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1931 年 12 月 15 日，在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下，第二次下野，

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1932年3月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3月，蒋介石被选举为国民党总裁，正式登上国民党最高“领袖”地位。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1949年1月2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下，国民党军队遭到惨败，蒋介石被迫宣告第三次引退下野……

—

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40分，蒋介石满腹惆怅地登上了“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悄然起飞。当“代总统”李宗仁闻讯带领一帮文武大员们赶到机场送行时，“美龄”号已开始在他们头顶盘旋。专机驾驶员依复恩按照蒋介石的吩咐，驾机在南京城上空绕飞一周。蒋介石凭窗俯瞰，向中华民国的“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两次下野，蒋介石都抱有重新复出的信心，今天他心中清楚，此生恐怕再难有“还都登极”之日了。此一别，蒋介石再也没能返回南京。

下午5时25分左右，“美龄”号专机在杭州笕桥机场降落。浙江省主席陈仪率政府官员前来迎接这位下野“总统”，并在西湖边最著名的饭馆“楼外楼”设宴，为蒋介石接风洗尘。陪宴的除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外，还有与他同机到达的俞济时和汤恩伯。陈仪特地点了一道蒋介石最爱吃的名菜“西湖醋鱼”——经过油烹的鲜鱼被浸设在美味可口的糖醋浓汁中，端上餐桌时，头、尾依然在摆动，鱼口还在一张一合。

然而，自下飞机后便一直阴沉着脸的蒋介石丝毫也没有兴趣去品尝这道经老厨师精心烹制的名肴。在座的其他人都情绪低落 神色黯然。只有陈仪神态自若 谈笑风生 频频劝蒋介石多用餐。

蒋介石手中的筷子几次点到“西湖醋鱼”但又都滑脱回来，他的手似乎在颤抖，一副心事重重、食不甘味的痛苦表情。

陈仪劝说道：“蒋先生 国事当头 应该拿得起、放得下才是！”

陈仪的这句话挫伤了蒋介石破碎的自尊心，他狠狠地白了陈仪一眼，一怒之下 掷下筷子 饭也不吃了 并拒绝到陈仪给他安排的位于西湖边的“澄庐”去居住 径自乘车回到笕桥机场的空军俱乐部 说是明日乘机去奉化方便。实际上 蒋介石此时已对陈仪产生了怀疑。一个月后 蒋介石接到汤恩伯的密报 说陈仪策动他起义。于是 蒋介石下令免去陈仪的省主席职务 派保密局长毛人凤把陈仪押解到台湾。一年后，陈仪在台湾被蒋介石枪杀。其实在“楼外楼”席间 陈仪口不择言 蒋介石即已对他产生杀机。

1月23日 蒋介石在蒋经国、汤恩伯、俞济时的陪同下，飞抵奉化栎社机场。从溪口武岭学校开来的几辆轿车早已在机场恭候多时。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归田”了 他又住进了建在亡母墓边的“慈庵”。

蒋介石名义上是下野“总统”但其威风与在台上时相比毫不逊色。军务局长兼侍卫长俞济时把总统府警卫大队六分之五的兵力都带到了溪口。为了保卫蒋介石的安全，俞济时把5个警卫队分别安置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 形成“外卫” 然后又从这5个警卫队中各挑选出4名卫士 组成一支便衣队 驻守在坟庄 以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 成为“中卫” 在“中卫”的内部核心 有资深的侍从人员 随

侍在蒋介石周围 成为‘内卫’。在这样层层严密保护下 蒋介石在溪口扮演着下野总统的角色。

既然已经下野 蒋介石就没有了‘总统’的名分 他的侍卫组织自然也就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 于是 蒋介石下令把他设在溪口的办公处命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 侍卫组织也随之更名为‘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表面上，蒋介石回到溪口后如一介平民，每日里闲云野鹤，寄情于山林泉石之间 实际上 他隐而未退 架设在溪口的 7座军用电台 日夜不停地向外发射着电波 蒋介石仍躲在幕后发号施令。被蒙在鼓里的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 雄心勃勃 又是派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进行和谈，又是布置兵力准备死守长江防线。但他很快就发现 自己这个‘代总统’只是一个在前台跳来跳去的傀儡，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幕后牵线的蒋介石手中。李宗仁后来回忆说：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 7座 随意指挥 参谋总长顾祝同 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 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 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得严密 实与退休之前无异。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想方设法拆李宗仁的台。在蒋介石的唆使下 行政院长孙科把内阁迁到广州办公 而‘代总统’李宗仁

事前竟一无所知。一时间 中华民国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2月5日 毛泽东发表文章讥评说：“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是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束手无策。1949年4月21日 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天后占领南京 李宗仁为自己生存计飞回了老巢广西。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呈现四分五裂状态。风雨苍桑，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已回到人民手中，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

蒋介石得知南京失陷的消息后，“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 不可言状。”4月23日 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当天 蒋介石神情默默地对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 我们要走了。”

蒋经国问：“父亲 我们要去哪里？”

蒋介石低头长叹一声，没有作答。

当天夜里 国民党海军‘太康’号军舰舰长黎玉玺中校奉命赶到溪口报到。他问蒋经国：“你知道不知道总裁明天要去哪里？”

蒋经国摇了摇头 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来看 无非是两个地方 台湾的基隆或福建的厦门。你就照此准备吧。”

4月24日 蒋经国把妻子蒋方良和三个孩子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忧。第二天清晨 蒋介石起床后 带着蒋经国来到母亲墓前辞别。然后，父子二人缓步登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的眺望”。“极目四望 溪山无语”。当时“天气阴沉 益增伤痛。大好河山 几至无立锥之地 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 今一旦抛别 其沉痛之心情 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蒋经国日记)

蒋氏父子从山上下来“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 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 心更有所不忍 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 徒增依依之恋耳。于是 父子二人悄悄登上侍卫们早已备好的轿车 直驶象山港 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太康”号军舰。直到军舰驶出港口后，蒋介石才出乎意料地吐露出此行的目的地 他告诉舰长黎玉玺：“去上海！”

包括儿子蒋经国在内的所有随从和幕僚们都感到愕然：南京丢失后 解放军几十万大军正挥戈指向上海 上海已是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去上海 是否……。其实 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道这个时候去上海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他实在放心不下！在上海还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还有正在往台湾抢运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白银 他要亲自去对汤恩伯“面授机宜”督促他指挥部队保卫大上海。

复兴岛是位于上海东北角黄浦江中的一座小岛，有两座桥与上海市区相连。蒋介石离开溪口老家后，住进了复兴岛。当天，他就在岛上分别召见了从南京逃到上海的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等将领。蒋介石一脸沉痛的表情，对他们说：“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 身为领袖 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会战结束之前就着手筹备京沪杭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 与首都与国民共存亡 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有人担心 首都失守 上海危在旦夕 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冒险到上海来？民国 26 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的第二天 我便由庐山返回了南京。当时我军进攻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数日未下，情况非常紧急。汪兆铭问我：‘这次中日战事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

了？’我说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会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我说的话你们听懂了吗？’

在对这些高级将领“面授机宜”之后，蒋介石为了使上海守军萎靡不振的士气振作起来，又连续分三批接见了上海守军团长以上军官，对他们训示说：“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了。”

能不能打6个月？凭什么打6个月？面对军官们的疑问，蒋介石从自己的“经验”和“自信”出发，训示说：“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这个混蛋，一炮未放就投降了敌人，让敌人轻易地渡过了长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战斗就撤退，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完全都是对的。北伐，我们是在困难中进行的，我们排除了困难，取得了成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受共产党的鼓惑发动叛乱，那是我生平最险恶的一关，也是党国存亡的关键，这一关我们也挺过来了。抗日战争，我们没有来得及充分准备，以后外援又被截断，那时处境极为困难，然而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大家想想，现在我们比起以往来说，困难总要少得多了，大家应当具有信心。”

面对将信将疑的军官们，汤恩伯替蒋介石作进一步的遮掩和解释说：“上海是个国际都市，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能将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直接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可以整个解决国际共产党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

一起解决了。”

一些高级将领也四处散布说：“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国出面，我们就有办法了。”

然而，除了空口许愿外，蒋介石实在是拿不出任何挽救败局的办法来。5月27日，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上海，消灭国民党守军15余万人，蒋介石在长江以南最大的一支战略力量宣告覆灭。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发起总攻击之前，仓皇乘军舰逃到台湾。

惊魂甫定的蒋介石举目四望，国民党在大陆上占据的地盘只剩下广东、福建和西南等几个狭小的地区。为了作最后垂死挣扎，保住福建和广东，蒋介石又于6月21日匆匆从台北飞抵福州。

蒋介石一下飞机，就在机场办公大楼内召开临时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参谋长兼福建保安司令范诵尧、第6兵团司令李延年、第25军军长陈士章、第73军军长李天霞、第74军军长劳冠英、第96军军长于兆龙、第106军军长王修身、独立第37师师长吉星文、独立第50师师长李以勳等将领。会议开始后，范诵尧首先向蒋介石报告战况说：进入6月中旬以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个军已进入福建东部，第二野战军一个军也已进入闽北，福建原有的共产党游击队也在闽东、闽西、闽北一带大肆活动，情况越来越严重。

接下来是各军军长和独立师师长报告各自部队的防务情况。除李以勳的独立第50师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外，其余各军、师长纷纷向蒋介石诉苦，要求补充兵员、武器和服装等等。第25军军长陈士章提出，该军经过几次转战，官兵的服装一直没有得到更换，现在已难以蔽体。第74军军长劳冠英向蒋介石报告说：第74军兵多枪少，虽再三向联勤总部

请求补发，但迟迟未能领到武器。劳冠英满腹怨气地说：“像这样缺枪少弹的，将来作战不力，责任应由谁来负担？”

第 96 军军长于兆龙、第 106 军军长王修身虽然也在陆军大学镀过金，但他们自知出身于杂牌而非嫡系，无法和陈士章、劳冠英这些嫡系将领相比，恐怕提出过高的要求激起蒋介石的恼怒，所以只是小心谨慎地陈述了自己的部队在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没敢提出什么要求。

蒋介石听完这些将领的汇报后，开始发表讲话。他先是假惺惺地自我表白一番：“我是一个下野总统，论理不应再过问国事，应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领导大家与共匪作斗争。但我想起先总理生前的付托，勉励我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斗。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

说到这里，蒋介石还有意装出一副振奋激昂的样子给众人看。针对众将领刚才向他诉的“苦经”，蒋介石又自我夸耀：“生平待士不薄。”他说：“本人自民国 13 年迄今，东征、北伐、剿共、抗日，作为最高统帅已长达 25 年，对官兵生活一向关心。今天听说有许多士兵衣不蔽体，这使我心中感到万分地难过。我在溪口、上海时，曾一再注意到各军的服装问题。因产棉区大多陷入匪区，我预料原料困难，曾多次指示联勤总部的郭总司令作最大努力去筹划。据郭总司令向我报告说在今年 6 月以前可以做好 250 万至 280 万套夏服，按实际人数基本上每名士兵可以分配一套。今天据陈军长报告该军士兵衣不蔽体，使我愧对部属。福州补给区缪司令来了没有？”

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缪启贤应声站了起来，蒋介石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怒加痛斥：“你是干什么吃的？第一补给分区的 16 万套装是如何分配的？你立刻列表报来，彻底查明下

落 否则我要法办你。缪司令 你听清楚了没有？”

缪启贤诚惶诚恐地回答：“听清了，卑职马上遵命办理。”

“希望各位军长、师长回去后 好好安慰部下 保证服装有着落。我回台湾后马上通知联勤总部补运。总之，这些事使我很痛心。”

蒋介石说到这里 把话题一转：“3 年来各战场均是一败再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众，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刚才听到各军、师长报告 除独立 50 师李师长以勋所部兵员武器充实外 其余各部兵员、武器均差很多。这个问题当前靠征兵、靠美援 俱难济于事 特别是武器一项不易解决。由于美国盟邦对我们失去了信心，美援越来越少，美械也愈来愈难得到 而国内各兵工厂都在大后方 产量有限 全国分配不足之数相差很大。大家应当知道 我们的盟邦美国 自抗战后期由于我国战略胜利 得到美援、美械的装备 六七年来已装备我军将近 100 个师 并且还有许多重武器、化学武器。大战结束后 美国目前存在菲律宾及日本冲绳基地的武器有限，盟邦看到我们屡打败仗 把援助的东西转而送给了敌人 并壮大了敌人 朝野俱有不满 认为援蒋等于援共 这真使我惭愧之至。现在武器来源不容易，大家再不体谅党国的艰难，随便遗弃武器如阔少爷一样 那就只有束手待擒了。依当前情况 将来美械补充仍会很困难 就是国产土造也难加数补充。敌人把我们的武器抢去 部队战斗力强大起来；把我们的兵俘虏去，反过来又调转枪口打我们，这的确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如果大家不下决心，以一死报国 将成为千百代子孙的罪人。”

蒋介石说到这里 好像很难过 指着第 74 军军长劳冠英说：“劳军长 你听清楚没有 你所带的部队 就是有人没有枪 何可耻 各军、师、团长回到部队去 要传达我的指示 人人做到爱枪如命。”

在对部下作了一番训斥后，蒋介石又一再强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的重要性。他说：“守长江及湘江的部队溃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陈毅的主力正在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进入福建。所幸共军摸不清福州的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用一个团的兵力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靖区司令的，只顾自己逃命，弃盔丢甲，沿途扰民，一直跑到福建。我姑念你们以前的功劳，才未让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竟擅自跑去台湾。对福建兵要之地竟失去坚守的信心，真是可耻之极！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基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共匪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天，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顿，作保卫福建的准备，用自己的热血来巩固台湾，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

在作了长篇训话后，蒋介石又单独召见了独立师长以上的主要将领。大多数人与蒋介石面谈的时间都不太长，主要是由蒋介石对他们作一番勉励。惟独最后一个被召见的李以勳，与蒋介石的谈话时间最长。蒋介石除了向他了解独立第50师的一些基本情况外，重点是向这位昔日的总统府战地视察官了解福建的一些内幕情况，这也是他当初把李以勳安插到福建的主要用意。

李以勳是广东省电白县正龙乡人，早年投军后在蔡廷锴的第19路军教导营中任过排长、连长，后被李济深选去当了警卫营长。1935年，他被保送进陆军大学高级班深造，后被派到薛

岳的第九战区任少将高参。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以勳历任第 6 军官总队副总队长、粤桂边区总指挥等职。1948 年初李以勳被调到蒋介石身边任参军，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委派他担任总统府特派战地视察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到淮海前线视察、督战。由于李以勳头脑机敏，勤恳忠诚，所以蒋介石对他非常器重。

蒋介石问：“听说朱一民、绍良主任每天醉酒吟诗，对备战很松弛，是否属实？”

李以勳据实回答说：“朱主任饮白兰地酒是经常的，但不很醉。得空时，爱和福州官僚、文人聊天，有时和省府秘书长曾小鲁互相吟诗。他对福建备战，是不很积极。据我看来，他死守福州的决心不大。2 个月前，总统府参军长李汉魂来福州，朱主任请客要我作陪。席间，李汉魂对朱主任说，历史上守福建没有成功的先例，劝朱主任要注意调整部署。朱主任当时曾表示：‘国家成败兴亡定于天数，非人力所能挽回。’上个月萨镇冰、陈绍宽、丁超五、何震等人向商人筹款，组成福州市民自卫队，共有 300 多人，目的是在国军撤退前后，由自卫队临时维持治安。朱主任事前知道这件事，并作了默许。如今校长要我们死守福州，上述这些事情，请校长估计一下。”

蒋介石非常认真地把李以勳的话记到笔记本上，然后他又问：“加强福州工事的问题，我一再向顾总长说过，要国防部赶快进行，也一再函告朱一民加紧构筑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作持久战打算。但是据说福州工事做得很差，没有一点计划。是否征工征料困难？还是福州绥靖公署不奉行我的指示，到底是什么原因？”

李以勳说：“在福州外围，野战工事有了一点，但很薄弱，除了 106 军在福州东郊，独立 50 师在福州大小北岭，第 25 军在福州西北郊，由鼎湖山麓迄洪山桥构成若干掩体外，有计划的守备

问题，福州绥靖公署并没有明确区分任务。至于半永久性工事却没有修筑。福州市长何震说，在福州做工事，征工征料不容易 除非政府拿出钱来。在上海有外围、主阵地、核心阵地三线工事 都守不住 何况福州这个背水城市呢？”

蒋介石听了后 连连摇头叹息 他接着问：“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论调，并曾多次对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么？他在陆军大学当教官时，你正在陆大上学，听过他的课吗？你谈谈他的情况。”

李以劭知道蒋介石在福州秘密安插了许多特务，他们这些将领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特务的监视之下，所以他在回答蒋介石的问话时 不敢随便敷衍。听到蒋介石问吴石的情况 他便老老实实回答说：“我 1940年考入陆大时，吴石已经调到柳州任第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讲课。1942年我从陆大毕业后 到第九战区任职，路经广西参加陆大同学聚餐时才和他认识。1947年我调到国防部工作时，曾和他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戡乱问题 他认为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 在战场上要想三年五载把共军消灭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战线长、战场宽 在江西围剿 3年都未成功 何况今天共产党羽毛已丰满了。今年 5月底他到福州后不久，就邀我到他的家中吃饭，他与我的谈话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 他认为 福州易攻难守 福建是山岳地区 便利于打游击 但打游击是共产党起家的本事 我们的游击本事比共产党差远了。从 3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 也无可战之兵 他这个绥靖公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样也是个饭桶。当今之计 从政略、战略、战术的诸方面来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 因共军没有战舰 不能水战。”

虽然李以劭措辞谨慎 暗中为吴石开脱 但蒋介石还是根据

福建特务头子王调勋的密报 怀疑吴石有通共嫌疑。后来 当吴石兵败逃到台湾后 蒋介石在恼怒之下 下令枪毙了吴石。

李延年是 从淮海战场死里逃生跑出来的，到了福建后表现得意志消沉，悲观厌世。蒋介石专门向李以勳打听李延年的情况：“李司令官对战局信心怎样 他抽大烟的癮戒掉了吗 近来是否还常打麻将？”

李以勳暗暗惊叹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真是无孔不入，就连这些带兵将领的私生活都侦察得一清二楚。他回答说：“近来李司令官的思想是消极悲观的。他上个月告诉我说，自总统引退后，人心大变 战也亡 不战也亡 这是中华民国国运问题。目前福建尽是败亡之将 惊弓之鸟 只知上骗总统 下压官兵 对上浮报 对下克扣 打起仗来只知保全性命。至于李司令官本人 生活腐化总统是清楚的。他到福州以来 爱在福州宫巷 20 号林则徐的重孙林长塘家中吸大烟，打麻将也是事实。不过他打仗有办法 判断敌情比较准确 气量较大 统驭上也较服众。他本人对总统是忠诚的 但对陈诚主席则非常不满 在思想上更亲近何应钦部长。”

蒋介石对李以勳的回答非常满意 对他鼓励了一番 然后又对李以勳讲了一通固守福建的重要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 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 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 就认为福建失了 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 为了大局 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体会我的心事 放胆去做 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 处绝境也可以求生。你应该知道 我们在政略和外交上是成功的 有我领导你们 有台湾在 即使大陆尽失 也可以复兴。”

然而，蒋介石费尽心机还是未能使士气颓丧的国民党残军败将们振作起来 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 于 8 月 17 日攻

占福州 随后又乘胜于 9 月 19 日对福建东南沿海的漳州、厦门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攻击，共歼灭刘汝明等 8 兵团和李良荣第 22 兵团 4.7 万人，于 10 月中旬解放了福建全省。

在人民解放军第 10 兵团向福建进军的同时 第四野战军第 4 兵团、第 15 兵团也向广东大举进攻，歼灭了国民党军刘安淇第 21 兵团、沈发藻第 13 兵团和胡璉第 12 兵团大部 共 6.3 万余人，于 10 月下旬肃清了广东省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至此，东南沿海各省全部得到解放。蒋介石在大陆上只剩下西南一小块地盘了。

二

蒋介石为了保住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个反共堡垒——西南地区 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 以便卷土重来”的梦想 于 1949 年 8 月 24 日 从台湾经广州飞到重庆 亲自部署西南防御计划。蒋介石一下飞机就在机场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将会再次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 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 振起抗战精神 为保持抗战成果 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一贯好讲排场的蒋介石 以往每到一个地方 当地的党政军机关都要强令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御用的社会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 这一次蒋介石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中央大员到重庆时 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政府再也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就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来 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头子 如四川袍哥石孝先、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人 聚集了一群帮会弟子，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虽然石孝先等人凑了又凑，但人数还是少得可怜，欢迎的场面显得冷冷清清。

自上清寺经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 在蒋介石沿途经过的地方 既没有挂彩旗 也没有乐队吹奏 只稀稀落落地挂着几条写在白布上的“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到西南主持军政大计”之类的标语。跟随蒋介石而来的几位中央大员看到这凄凉的情景 都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 纷纷责骂重庆市党部和市政府“太不象话了”。

蒋介石一到重庆 便于 8 月 29 日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外 还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伦、钱大钧、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等高级将领。会议开始后 首先由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保密局特务头子徐远举报告解放军在西北、华南各地进军的情况 随后由第三处副处长孙伯先汇报了西南长官公署所辖部队布防情况。第三个发言的是胡宗南手下的副参谋长沈策，他大肆吹嘘说胡宗南集团有充分把握守备秦岭地区 必要时甚至还可以向关中进攻 收复西安。

在这些人汇报完毕后 蒋介石发表讲话。一开始 他想安定众将领的情绪 开口便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 形势即将好转。”但局势是怎样“稳定”的 形势又有哪些“好转” 蒋介石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来 只是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 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当了 觉醒过来了 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下来，蒋介石一再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鼓励众将领同心协力 把西南建成反共的基地。蒋介石啰啰唆唆讲了半天 没有说出任何具体方案和计划 只是翻来覆去地讲：“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 100 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 绝对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 坚定信心 坚持奋斗 以争取胜利。”

这个军事会议仅开了半天就散会了，与会的高级将领们没有从蒋介石那里得到关于作战方面的任何具体指示，众人更加

感到惶恐不安。当天下午，第 15 兵团司令罗广文邀请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郭汝瑰等人到他的办事处聚餐。席间 这些兵团司令们交换了一些关于时局的意见，心中无底的胡宗南提出一个建议 由众人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 就近指导他们作战。罗广文等将领一致表示同意 于是就由第 21 兵团司令郭汝瑰和第 15 兵团参谋长赵秀昆共同执笔，写了一封联名信，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西南地区的军政党务；使西南地区全体军民团结一致 奋斗图强 国家前途 实深利赖。’然后推举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等人于第二天当面呈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完信后 先是发了一大通议论 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国民党几百万党员特别是高级军政官员身上 指责他们 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 他又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 调训负责干部 由我亲自主持指导 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以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 因此 我要经常住在台湾 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 只要你们大家齐心协力 能撑持一个时期 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 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 以争取最后胜利。”

胡宗南等人苦苦哀求蒋介石留在西南，蒋介石坚决不答应，只是表示说：“以后我可以常来四川 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各军师团长。”

自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一些亲信在国民党内发起了一场‘劝进’运动 想让下野’ 引退’的蒋介石重新复出掌权。可是‘代总统’李宗仁以民国‘宪法’为盾牌 死顶着不肯让位。作为蒋介石一手栽培起来的‘黄埔学生领袖’胡宗南 在这个时候提出让蒋介石留在西南指挥作战，其本意是想借此机会为蒋介石的复出提供一个合法的借口和台阶。可是，蒋介石